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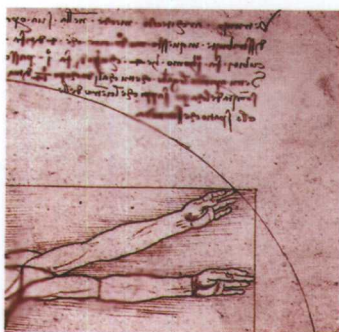
近代西欧印刷

媒介研究

——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

华东师范大学
青年学术著作
出版基金

JD



JINDAI

XIOUYINSHUJAMEIJI

YANJIU

项
翔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青年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近代西欧印刷

媒介研究

——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

项翔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 / 项翔
著.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ISBN 7-5617-2581-7

I. 近… II. 项… III. 印刷史—西欧—近代

IV. TS8-09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6640 号

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

——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

著 者 项 翔

责任编辑 刘国良 杨 雁

责任校对 李京林

封面设计 高 山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http: //www. hdsdbook. com. 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5. 625

插 页 2

字 数 158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一次

印 数 001—2100

书 号 ISBN 7-5617-2581-7 / G·1207

定 价 10. 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序

伴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知识经济的时代已渐露端倪。无论我们怎样概括知识经济的内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知识”将在经济体系和经济发展中起着愈益重要的作用。正如有些学者所断言,今后经济发展的动力不再像传统经济那样是由土地、资本等要素所决定,相反而是由知识本身来决定。同时,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划分也不再是资本的多寡,而在于知识创新和知识总量的差异。面对这样一种现状,面对知识创新的时代,历史学将作出何种回应。难道历史学就应该因袭传统的程式,并以此而沾沾自喜,我们能否走出“象牙塔”,用历史学这一传统的“知识”体系来解答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这一中心内容。

放眼国际史坛,令人高兴或令我国历史学人自叹不如的是,在西方诸国已有一批历史学家正在“新社会文化史”的旗帜下开始研究“知识”,探讨知识的组织和传播,以及人们对知识的接受等内容,他们将此称之为“知识的社会史”或“知识社会学”。已取得突出成绩的当属目前风头正健的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和美国历史学家达恩顿,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印刷媒介这一过去不受重视的内容进行研究,进而探讨知识、文化、社会等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如伯克出版的《知识的社会史:从谷腾堡到狄德罗》,达恩顿出版的《猫的大屠杀以及法国文化史中的其他事件》等著作令人耳目一新。

值得欣喜的是,项翔博士作为年青的史学工作者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注视到了国际学术界这一新的研究趋向,并以强烈的时代责任感选择了印刷媒介这一新的课题,从新文化史和知识社会学等多重

视角进行研究,历时三年,终于写成《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博士论文。当这篇论文提交答辩时,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之后,他又作了修改补充,使之更为充实后送交出版。此书的出版不只是意味着项翔个人的学术成果得以问世,更重要的是,它也体现着中国世界史研究在跟踪国际史学发展,转换研究范式,更新研究内容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思想家卡尔·波普尔曾经说过: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在这里,波普尔指的是法国启蒙思想的传播使人们摆脱了依附,获得了人的独立和解放。那么,这一传播过程到底如何进行,哪些人在接受知识和接受程度又如何,这是历史学者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沿着这一思路,项翔详细考察了印刷媒介在知识、思想传播中的过程与功能。他选择了西欧历史上划时代的标志性事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为个案来进行探讨,从另一侧面解释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得出了较之以往不同的新认识。如对启蒙思想的传播及其与大革命的关系,作者通过详细梳理材料后得出结论,启蒙思想最大和最多的受众是即将在 1789 年革命后迅速崩溃的阶级,而不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颠覆法国既已存在的深层传统文化。类似这样新颖的结论还很多,如对印刷媒介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作者指出,“印刷—资本主义”所产生的语言是一种不同于以往官方地方语言的强力语言,它成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有力工具,为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并重新塑造了欧洲地缘政治格局。这样使得本书较有创见和充满新意。

事实上,我们不仅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就知识而言,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有理性启蒙的知识,有民主自由观念的知识,也有经济、社会和科学等知识。这表明了“知识”本身有着丰富的内涵。在此书中,项翔同志注意到了这一点,不仅选择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这些重大事件来探讨思想的传播及其意义,而且也细致地考察了印刷媒介——作为知识载体在传播一般知识的过程和功能,特别

是在西欧近代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新知识纷至沓来,知识更新大大加快,如海外探险后出现的新地理知识,资本主义发展后的经济知识,植物学、动物学、解剖学、天文学等新科学知识,这些新知识都是通过印刷媒介而走向大众,进行传播普及。因而印刷媒介在创造近代初期的“知识爆炸”和传播新知识方面功不可没。

综观全书,作者不仅在潜学沉思后厚积薄发,屡有创新,而且在对材料的搜集和梳理上也颇下工夫。如果说前者是一种学识与思辨,那么后者则是学养和积累。在历史研究中这两者均不可缺少,没有扎实的史料何来思辨与创新。我们看到,项翔在大量材料中披沙拣金,梳理细密,如对古腾堡发明印刷术的考证,印刷术在欧洲的传播等都可以看到作者的一种学术积累。

攻读博士期间,项翔不因天资聪慧而懈怠,依然好学上进,感悟学术,接受着严格的学术训练。他参加了一些研究课题,出席过多次学术会议,发表了十余篇学术论文,并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在这样的学术熏陶和实际的学术研究中,他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创新意识强。这也是这一代年青史学工作者的优势。在这本著作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这一特色。对此,我们也感到由衷的喜悦。

长期以来,项翔博士一直有一个颇为“宏大”的研究计划,不仅要研究传统的印刷媒介,而且也要研究方兴未艾的信息技术。毕业后,他去了上海市信息化办公室,为自己的研究得到了最直接的条件,最近他又获准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博士后,又有了一个有利于自己研究的新的学术氛围。在此,我们既祝贺本书的出版,同时也期待着他日后作出更大的成绩。

李宏图

2001年6月10日



作者简介

项翔，1973年10月出生于浙江金华。1994年在浙江大学获学士学位；1997年和2000年分别在华东师大获硕士和博士学位。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的专业分别是文物博物馆学、西方近代思想史、世界近代史。已发表史学论文近十篇。现就职于上海市信息化办公室。

目 录

序	1
---------	---

第一章 多元学科视野中的印刷媒介史研究	1
---------------------------	---

一、史学中的印刷媒介史研究	2
---------------------	---

二、传播学视野中的印刷媒介	9
---------------------	---

三、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中的印刷媒介	11
-----------------------------	----

第二章 欧洲印刷术的出现	18
--------------------	----

一、中国的造纸术及其西传	18
--------------------	----

二、欧洲的手抄本时代	24
------------------	----

三、东方印刷术与欧洲印刷术的关系	29
------------------------	----

四、欧洲的雕版印刷术	35
------------------	----

五、欧洲活字印刷术的出现	38
--------------------	----

第三章 印刷术在欧洲的传播和印刷媒介的发展	45
-----------------------------	----

一、技术史中的欧洲活字印刷术	45
----------------------	----

二、印刷术在欧洲的传播(一)	51
----------------------	----

三、印刷术在欧洲的传播(二)	57
----------------------	----

四、印刷媒介形式的发展:地图、报纸和期刊	63
----------------------------	----

第四章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印刷媒介(一)	74
一、古典著作的印行	77
二、印刷书籍消费的扩展	85
三、印刷与近代民族语言的形成	90
四、作为“民族主义建筑师”的印刷术	98
第五章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印刷媒介(二)	102
五、宗教改革中的印刷媒介	102
六、印刷媒介带来的一些文化特性	116
第六章 17 世纪和启蒙运动时期的印刷媒介	125
一、17 世纪英国的大众印刷媒介	127
二、17 世纪法国的上层文化和印刷媒介	134
三、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印刷媒介(一)	138
四、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印刷媒介(二)	149
余 论	163
主要参考文献	166
一、西文文献	166
二、中文文献	169
后 记	172

第一章 多元学科视野中的 印刷媒介史研究

长期以来,由发明和科技进步所带给我们的不少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物,它们的历史渊源、在文明史中的意义却常常被人们所忽视,或者是语焉不详。的确,在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中,人类通过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实践,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发明和各种别的形式科学技术的进步。所有的科技发明和发现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状况,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有几项发明和发现对人类文明史来说却是关键性的,当然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印刷术便是极大地改变人类文明史进程的重要发明。培根在欧洲活字印刷术发明了大约一个半世纪以后就格言式地宣称“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效能和后果,这几点是再明显不过表现在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而起源却还暧昧不彰的三种发明上,那就是印刷术、火药和磁石,因为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① 可惜的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几乎带过了就这些发明对世界所产生巨大影响的深入探究。火药和指南针所带来的改变因涉及的领域比较局限,因而也较为简单,处在常人想象所及的范围之内。而印刷术带来的却是人类信息存储和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逐渐扩展到几乎所有民众的知识获得与日常的生活方式之中。这一过程以及所涉及的人类历史进程的方方面面都似乎漫漫无际。本书就试图对印刷术及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影响作一些尝试性的研究,力图在人们关于该问题的常识之外作出学术性的梳理和总结。

^① 培根:《新工具》,第103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印刷媒介(Printing Media)这一概念来自于传播学。Media 是 Medium 的复数形式。Medium 一词源于拉丁语 medius, 意为中间, 其形容词意为中间的、中等的、适中的。它的名词的意义除了中等、中庸、适中以外, 引申义有介质、导体、手段、工具、方法、(生物的)生活环境, 以及通常用作复数形式的传播媒介等义项。媒介是使传播实现的载体和途径, 在大众传播中即为大众媒介(mass media), 它使得信息可以传达广泛的人群。^①广义地说, 媒介是一种能够使传播得以发生的中介(intermediate agency), 说话、写作、手势、表情、服饰、动作、舞蹈等等都可以被视为传播的媒介。但在实际应用中该词的词义在衰减, 被更多的从大众传播的技术角度方面进行了界定, 用来单指实现大众传播的技术形式, 有时也用来表示大众传播的方式和手段。^②在本书的研究中, 媒介一词的意义即为大众传播的方式。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印刷媒介包含了通过印刷物进行信息传播的整个过程。

一、史学中的印刷媒介史研究

由来已久的印刷技术史、出版史、书目学、图书馆学、文学史、新闻史是关于印刷媒介史这一主题的最早研究方式。它们的研究, 发掘整理了最基础性的史料。但是, 这些领域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重点是, 印刷出版的产品及其生产者。如印刷技术发展、版本考订、重要著作或报刊的出版等, 这些都是它们老生常谈的研究领域和思路。诸多以作品为主要线索的出版史, 尽管也总是要或多或少涉及一些著作的历史影响和社会意义, 但是更多的是就著作本身来说

① The Oxford Dictionary, vol. IX, p. 439, 542.

② O'sullivan eds., *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2nd edition, 1994, London & New York p. 176.

的,缺乏对著作传播整体过程的关注,进而导致对影响和意义概括的不精确。而且,这类研究的视线也很少涉及印刷技术或印刷产品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这两方面的局限注定了它们的基础性地位。因此可以说,在史学界大规模介入印刷媒介史的研究之前,该领域的研究尚属十分典型的行业史范畴。随着研究的深入,各种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将越来越深入和广博,其研究者当然也将超出原先的范围。

在传统史学研究的视野中,印刷媒介起的作用仅仅是为研究者提供史料和对其历史作用进行的简单评估。史学研究者无一能够逾越自印刷术发明以来的浩如烟海的、各种用印刷手段记载与流传下来的各种形态的史料。不少史学研究者因为对印刷这一历史现象习以为常而无甚感受,有的史学研究者虽把印刷术的出现视为文明史上划时代的标记,然而对其历史意义的整体评估总显得十分粗概,甚至不屑一顾。布克哈特在其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对文艺复兴时期所出现并开始在西欧广为传播的印刷术,只是在《古代著作》一章中有简单的提及,其深远的历史性意义则几乎没有论述。^①

印刷媒介史研究的勃兴得益于社会史的发展,年鉴学派的史学家成为这一领域最早的开创者之一。年鉴学派两鼻祖之一的吕西安·费弗尔(L. Febvre)1957年逝世后,在马丁(H.-J. Martin)的努力下,著名的《书的来临》于次年出版了。^②该书的研究范围覆盖了欧洲整整三个半世纪的印刷书籍的历史,特别重要的是,它还专门论述了印刷书籍在这段历史进程中的影响和意义。这部被收入“人类的演进”(Evoluation de L'Humanite)丛书的著作虽然有人认为是马丁做了其中的大

①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89-198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② Lucien Febvre, & Henri-Jean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aris, 1958. English version, *The Coming of the book: The Impact of Printing 1450-1800*, tr. David Gerard, London, 1976. 遗憾的是,国内大多数对年鉴学派的介绍和研究中都未提及该著作。

部分工作,但书中无不闪烁着第一代年鉴史学家的思想方法。费弗尔曾对文明下过这样的定义,“文明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即物质和精神的合力,知识与宗教的合力。这些合力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社会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发挥着作用”。^①无疑,印刷出版物最能集中体现各自所诞生时代的这种“合力”。印刷物可以成为透视普通人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窗口,其本身也就成了年鉴学派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范畴了。马丁在十年之后出版了《17世纪巴黎的书籍、权力和社会(1598—1701)》。^②该书的内容超出了书名所界定的范围,因此有人把它说成是合著的续编。但是马丁在该书中主要论述的是法国封建专制王朝鼎盛时期巴黎的社会文化状况,从覆盖的范围来说显然不是前者严格意义上的续编。不过,从被认为是前者续编的评价中也足见该著作的水平。这两部著作应该被视为年鉴学派在这一领域内最早的一些贡献,他们的筚路蓝缕引导了年鉴学派众多学者开始对印刷媒介的历史研究,进而推动了在欧美学术界出现的对印刷媒介的研究热潮。

对社会史、文化史、心态史的研究势必要求研究者“向下看”。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为新史学所广泛重视。如德吕木(J. Delumeau)、芒德鲁(R. Mandrou)等史学家都试图从书籍的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透视大众文化,反映与精英文化的区别。芒德鲁在探索近代法国“集体心理”变化时,就有意识地从印刷书籍的生产和流通以及反馈中着手研究。在纪念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被新闻媒介称之为“二百周年之王”的孚雷(F. Furet),他作为年鉴学派史学家的早期研究竟然也以印刷媒介史为重要的主题,他在《读与写》和《书籍与社会》^③这两

① Lucien Febvre, *Pour une Histoire à Part Entiere*, Paris, 1962, p. 529.

② Henri-Jean Martin, *Livre, Pouvoirs et Société à paris au XVIIe Siècle 1598 - 1701*, 2vols, Paris, 1969.

③ Francois Furet, *Livre et Societe*, 2vols, Paris & Hague, 1965—1970; Furet, & J. Ozouf, *Lire et Ecrire*, Paris, 1977.

部著作中,与合作者充分运用了数理统计,对各个地区各个社会阶层的识字率、书名、作者、书评、读者、出版者、学术机构的社会构成以及各类术语概念的出现等诸多项目的“结构性数字资料”或“非结构性数字资料”^①进行了数理统计分析。这些研究较为精确地揭示出某些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势。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孚雷后来在大革命史学中提出的对进步主义史学传统的巨大挑战,正是基于这些结合社会文化发展的计量方式的研究,这是他认识大革命爆发基础的重要来源。而对大革命文化起源上的研究,恰恰十分容易得出关于大革命的一些不同于进步主义史学传统的认识,如“精英革命论”。

夏蒂埃(R. Chartier)与罗歇(D. Roche)是当前年鉴派学者在印刷媒介史研究领域中的代表人物。有人认为他们的研究是心态史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特别注重从阅读史的角度去考察印刷媒介的历史效用。毫无疑问,阅读史是反映特定人群心态的极好材料。年鉴派学者的这些研究至今领导着国际近代印刷媒介史研究的潮流。

除法国之外,历史学领域中进行关于印刷媒介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美、德三国。1955年,德国的斯坦伯格(S. H. Steinberg)出版了被视为雅俗共赏的印刷史著作《印刷五百年》。他认为“印刷史是整个文明史不可或缺的部分”。^②这部著作作用相对不算长的篇幅覆盖了欧洲整整五个世纪的印刷史,没能达到年鉴派史学家在这一问题上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尤其是它在叙及19世纪以后部分时显得更为单薄。但是它在论述古腾堡印刷术发明一个世纪以内的时段里,所引用的不少史料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屡屡被后人所引用。德国人赫尔施(R. Hirsch)在研究古腾堡印刷术出现后一个世纪的相关

① 孚雷:《历史学中的计量》,载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120、12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② S. H. Steinberg, *Five Hundred Years of Printing*, 2nd edition, Baltimore, 1961, p. 11.

历史时,则从“印刷、销售和阅读”三方面切入进行研究。^①有意思的是,这两部代表德国学者关于印刷媒介史研究的著作,其出彩之处或研究重点都在16世纪中叶之前,而德国又是欧洲印刷术的故乡,这两者之间多少有些微妙的联系了。

英国学者阿尔提克(R. D. Altick),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出版了专门研究英国大众阅读历史的著作《英国的大众读者》。作者自称这部两卷本的著作是研究19世纪英国大众阅读的社会史,“尝试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研究阅读在工业化和日益民主化社会中的地位”。^②不过,其中有很大的篇幅回顾了印刷术从1476年传入英国以来到1800年的相关历史。阿尔提克实际上关注的是印刷物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因此在印刷媒介历史研究的进程中,这一著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瓦特(T. Watt)的《廉价印刷物和大众虔行,1550—1640》,试图通过对印刷媒介的研究来考察新教对英国人的阅读心态以及各种思想在社会中传播的影响。她认为通过游吟诗人和各种商贩,印刷文化可以到达英国的各个角落。即便是穷人或文盲,也可以在各种场合看到宗教题材的印刷图像而受到了印刷物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廉价印刷物是一种社会粘合工具,它把越来越多的人带入公众阅读。各种思想、故事、形象和价值观念通过多个层面进入了英国社会。同时得出宗教改革并没有使社会迅速从口语和形象化的文化转向以印刷为主体的文化,无论大众还是知识阶层,口头与形象化模式的理解和表达依旧处于中心地位。^③

在美国,研究者一定程度上承认“新的”印刷媒介史的研究是从法国年鉴学派处引进的。^④美国传统的印刷媒介史的研究只是印刷

① R. Hirsch, *Printing, Selling, and Reading 1450—1550*, Wiesbaden, 1967.

② R. D. Altick,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ss Reading Public 1800—1900*, Chicago & London, 1957, p. 1.

③ T. Watt, *Cheap Print and Popular Piety*, Cambridge, 1991.

④ 卡伦·温克勒:《对印刷文字的研究热潮》,《交流》1994年第2期。

史学者和历史文献学者的领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印刷媒介史的研究中心在美国。1991年,美国成立了“作者、读书与出版史学会”(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Authorship, Reading and Publishing);剑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出版社等出版机构系统地出版这类研究的丛书;美国文物工作者协会(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编纂了一部多卷本的美国书籍文化史;宾夕法尼亚大学还新建立了书籍史研究中心等等。他们不管所研究的印刷物的形态,而把这一系列的研究统称为“书史”。

美国印刷媒介史的研究者众多,来自历史学、文学、图书馆学、文献学以及各种与印刷媒介相关的行业史领域。其中爱森斯坦(E. L. Eisenstein)和达恩顿(R. Darnton)是两位不得不提到的史学家。爱森斯坦在她的名著《作为一种变革动力的印刷出版》中说明了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原因。她“在从事了几十年西欧史的研究和教学之后,不满于现所流行的近代早期有关政治革命和心智(intellectual)革命的解释”,^①于是开始思考15世纪传播方式变迁以后的历史后果。但是她当时竟然“找不到一本书,或者哪怕是一篇可观的文章论述15世纪传播变革所带来的历史后果”。^②她把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论述西欧从手抄到印刷的变革,并力图拟列出这次传播革命的主要特征;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印刷出版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中的历史作用。她颇为自信地宣称,第一部分的内容是除书籍史专家以外大多数历史学家所不熟悉的领域;尽管后一部分所涉及的历史过程为许多史学家所熟悉,但她试图从印刷术所带来的传播革命的新角度进行研究,并且承认这部研究范围覆盖西欧印刷术出现两个世纪以后历史的著作是属于论著,而不是档案研究。的确,一般的历史学家不可能掌握14—16世纪语言背景等极其复杂的第

① E. L.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New York, 1979, pp. X - XI.

② Ibid., p. XI.

一手材料。爱森斯坦的这一著作在美国书籍史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有意义的是,达恩顿的史学研究重点和爱森斯坦一样也是集中在法国。达恩顿以印刷媒介史的研究为切入点,着重透视法国从旧制度到大革命的社会文化变迁。他在1984年出版的著名的《猫的大屠杀以及法国文化史中的其他事件》一书中,在对印刷媒介的研究中引进了文学批评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把“文本”、“符号”、“语境”等概念应用到文化史的研究中,倡导所谓的“历史学的人类学模式”(anthropological mode of history)。他对在年鉴传统影响下的法国的文化史研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法国人试图通过计量大众的死亡、对炼狱的描述、书名、学院里的讲演、财产目录中的家具、治安记录中的犯罪情况、遗嘱中对圣母玛利亚的祈祷,以及在教堂中向圣徒所赞助蜡烛的磅数的方式,来测定大众的态度”。他认为“文化对象”(cultural objects)与经济史、人口统计史研究所要求的连续化的资料有着不同的性质,因为它们“不是由历史学家所制造的,而是由他们所研究的对象所制造的。它们滋长意义,它们需要被解读而不是被计算”。文化也不能被视为肖努(P. Chaunu)所说的三层结构(经济、社会、文化)中的一层,因为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具有文化性质,哪怕是那些被我们限制为“经济的”或“社会的”。通过强调计量和他们“对社会交往中符号因素的低估”,法国史学家在最近的分析中忘记了什么是本质。^①这种对计量的过分依赖和对社会交往中符号因素的忽视,的确可能使得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陷入尴尬的境地。达恩顿在1989年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活动中与纽约公共图书馆合作举办了“印刷中的革命:法国,1789”的展览,把革命的历史通过尘封的印刷物传递给广大观众,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同时也向大

^① R.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1984, pp. 258 - 260.